

金 酒

“市属单位”——这此地上的单位，影响或这
其它单位还有，但据其关系是这

方便之门，而且
车，为，北过去的情况，
门上设门卫，门卫至少要有三
又不能二十四小时象棍子似地
一个临时门卫室。

，经费。建个门柱事情不大，
但属于基建，必须请拨款专项
委兜里没钱，要花钱必须
在市里，市委有不容争议的决
策领导权，但是行政大权，特别是经济大
权掌握在市政府，何宏观决策都会给
留有余地。市长是
委副书记，不肯把市政府变成市
的副手，和市长之间总有
最妙的。不说但人人都可
到，所以办公室的
义光，经费的报告，
时抄报市委，市建委、市财
局，待市委、书记批准后，再
书记的批示去找市长或副市长，经过几
道关卡，最后才由财政局审核，决定给不
给钱，给多少。

，总务处长王同顺马不停蹄，足足跑了
十四天，经费，便门、施工俱备项才有了
眉目。这期间，杨书记亲自过问了三次，
秘书长过问了六次，办公室主任
时不在过问，推辞点说，事情复杂，
王同顺一起干的。

诸事齐备，此门开工，就达书记又记
部秘书长和警主隔，这还了得？须得另开
一个临时门，门只有开在市委领导家属院
跟市委大院之间的隔墙上。

小说选

自序

据说，荆轲刺秦王没能得手，主谋燕太子丹见势头不好，逃到了辽南。辽阳附近的太子河因此得名。河不大，还经常闹水灾。就算这事是真的，同中原、沿海比，东北地区也开发较晚，传统文化的积淀不很丰厚。在孔夫子率领他的门生为儒家学说奔走呼喊的时候，东北还是一片阒然的文化旷野。不过，这并没有妨碍中国传统文化向东北辐射、扩散的进程。东北文化的躯干依然是中原文化。

东北地区少一些传统文化的沉积，也少一些传统文化的禁锢，增添了一些传统文化中少有的东西。在中原传统文化向东北扩散的同时，女真人、契丹人、高句丽人、蒙古人以及其他生活繁衍在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以干戈和玉帛的不同方式投入了创造东北地区文化的历史长征，并数度入主中原。后来，它们失去了盛世雄风，留下了渤海遗址，高句丽古墓，中京辽塔，萨尔浒古战场和努尔哈赤的福陵。除了这些夕阳残照中的古迹还有什么？几百个难认的契丹文字、格登格登的木底鞋和旗袍？或者是民俗学家感兴趣的别的什么遗

风？我想不是。我以为少数民族对东北文化的宝贵奉献最重要的部分是隐形的。由于隐形，所以常常被人忽略。这就是民族的心理、气质、个性和观念。剽悍好斗，勇于冒险，不拘成法，善于吸收，坦率粗豪，也有刁滑懒散。永久地浸润东北大地的这些文化成分给东北文化增添了可贵的力度。

移民也是东北的历史功臣。这些关内的饥民和流放犯算不上英雄豪杰。“闯关东！”难得一个“闯”字。没有点冒险精神，没有“豁出去”的气概，是难以在这块荒蛮而神秘的土地上创业生根的。直到今天，白胡子老爷爷的永久话题也是一根扁担两只筐的开拓史。

今天的东北是一个生气勃勃、蕴藏着巨大潜力的东北。它在国家经济生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几乎它的所有经济部门都代表着中国现代经济的发展历程。它为东北人表现个性提供了世纪舞台，也为东北文学提供了令人着迷的原材料。

文化是文学的土壤。未见文学的参天大树从文化的不毛之地长出来。但文化准备并不完全决定于历史的长短。世界上不少没有悠久文化传统可供夸耀的国家和民族，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创造出举世瞩目的现代文化，包括杰出作家在内的科学文化天才密如繁星，使人眼花缭乱，趋之若鹜。

历史的，现实的，文化的，经济的，人文的，自然的，文学的，非文学的——不管从某一个角度看，还是从综合条件看，东北的作家不应该有弗如之叹，不该自卑，东北有条件创造出壮盛的文学局面，有条件出现众多的一流作家和作品。

在新时期的第一个文学十年中（1976—1986），东北地

区的文学有了历史性的进展。一些早就饮誉文坛的老作家不断有新的突破。一大批中青年作家带着虎虎生气走上文坛。更大一批人正在狠劲擂响文学之门。我们有理由为此欣然，但也有必要自省——我们还没有达到本来应该达到的境界。

更新观念，开阔眼界，广采博收，交流借鉴，深入生活，改善体制，落实政策……文学本身的，文学以外的，各种原因和对策可以举出千条万条，条条都有道理，差不多都“放之四海而皆准”，没说的，认真努力就是了。

但是，在这千条万条中，有一条是要经常注意的：创作主体的心态问题。我总觉得，我的许多同行在创作和竞争中缺少必要的自信。我们靠爬格子吃饭，做梦都在爬，但又常常把自己当作文学殿堂的不速之客。有如小女子不得不击响大老爷堂前的皮鼓，在喝喝咧咧的堂号声中，低眉顺眼、颤颤巍巍地来到堂前，一面“启禀大人”，一面心里嘀咕：“大人允许吗？这样说行吗？会不会挨板子？”文学殿堂中，有成就大小者之分，却没有老爷与小民之别。进入文学殿堂的人都应该有“玉朝马汉开道”的气概。我非常欣赏杨大群同志的一句名言：“往写字台前一坐，我就是托尔斯泰！”充分自信的人是幸福的。我常常犯自信缺损症。

自信，不能理解为占山为王，夜郎自大，自吹自擂，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自我感觉良好”。因为这里充塞着狭隘、无知和盲目。搞文学艺术的人几乎没有哪一个不以为自己的作品是好的，更有甚者简直容不得别人的批评，而对好听的话又过于沾沾自喜。这不是我羡慕的自信。相反，我觉得这可能是缺乏自信的症候。只有缺乏自信的人才过于看重别人对自己的反应。

作为一种可贵心态的自信是一种强韧的主体意识，即认识自我和实现自我的意识。它要求自己对自己投信任票，相信自己的才干和潜能，对自己选择的合理性与成功坚信不移，并努力调动自己的全部条件去实现。不到黄河不死心，到了黄河也不死心，要跨过去。没有船，乘羊皮筏子；没有羊皮筏子，就游泳；不会游，可以现学。相信自己能学会，因为在母亲肚子里就演练过。为了达到既定目标，要做到不为鼓掌喝彩晕头胀脑，也不为蜚语蛙鼓拂乱所为。

虽然自信是一种心理状态，但它的效应却远远超出了精神、心理的界限。古人云：人皆可为尧舜。这里讲的是道德实现。倘把尧舜当作有本事的大人物，这个判断也同样成立。人的潜力简直大得惊人，不亚于原子核。据西方有关学者研究，一个人勤学苦练、宵衣旰食干一辈子，自己的潜能也只开发了区区4%！倘把人的潜能比作核能，那么自信就是轰击它使它发生裂变的高速粒子！现代心理学家证明，信心不但能使人增添聪明才智，还可以改善人的气质、风度，使人的声音变得圆润悦耳，眼睛变得明丽迷人，甚至体型也会变得健美多姿。神了！倘若我们这些作家能多一些自信和强者意识，少一些自卑和游疑，也许我们就干得更漂亮一些。

当然，文学中的许多问题也不是作家的自信能全部解决的。出书难，就是一个不大不小、不大好说又不能回避的烦人问题。跟外国同龄作家比，中国作家的作品大都偏少。过去，非文学的东西对作家侵扰太多，政治运动搞得人如惊弓之鸟，大批判，“天天读”，柴米油盐酱醋茶，穷于应付，疲于奔命，所以坐在写字台前的时间少得可怜。现在，这些问

题基本解决了，或者开始得到解决，可是这惨淡经营，写出书来出不了，不是也够糟心的？也许这是中国作家天生的苦命？

不能出版，先放在哪儿，“藏之名山，传之其人。”这倒是好主意，但前提条件是作家们须是先富起来的万元户，不然老婆孩子都不会让你继续去创造废纸。走俏的书有两种：一是发行量大、有经济效益的通俗小说，二是有较高文学价值、能给出版社带来声誉的名家杰作。但是，这两类作品又不是每个作家都能达标的。作家谁不想把作品往好里写？大文豪也不是字字珠玑，篇篇锦绣，何况一般？

自信不能在云端产生。成果往往是自信的培养基。哪怕一颗天生的自信种子，自信的结果总化作一缕青烟，自信也会枯萎。就算你的自信象钢丝一样坚韧，总是用失望的锤子敲它，也会脆化和断裂。金属也会疲劳。我们编辑出版这套辽宁作家自选集，就是为辽宁作家把创作成果变成社会财富聊尽绵薄。希望此举能保护和增强作家们的自信。

在辽宁作家自选集的编辑出版中，得到了沈阳出版社的诚挚扶助。无论作者或读者都会感念此种远见和功德。

1988年4月

目 录

自 序.....	金 河
市委大院的门柱.....	1
大车店一夜.....	17
猫眼儿.....	39
杏花山下的孩子.....	52
带血丝的眼睛.....	67
神童.....	91
重逢.....	116
不仅仅是留恋.....	140
贺老山的梦.....	156
典型形象.....	172
白色的诱惑.....	212
鹦鹉嘴有个天下乐.....	233
借光.....	249
打鱼的和钓鱼的.....	268
黄桃.....	288
堵塞.....	309
后 记.....	326

市委大院的门柱

市委书记姚达上班总是安步当车。

这里没有微服出访、体验民情、体察民意的意思，也不是为了给国家节约能源、跟普通老百姓划等号。姚达不喜做那种有新闻色彩的事情。

市委领导的家属院跟市委大院只有一墙之隔。出家门，进机关门，从从容容，有五分钟足够。姚达把这五分钟的路作为早饭后必要的健身锻炼，也作为一天紧张公务前的必要准备。运动员下场前不都要抻一抻，跳一跳，松活一下筋骨么？

水泥方砖铺的人行道平平展展、干干净净的。树下的最后一点残雪也在前一天化掉了，苍黑色的泥土是潮润的，散发着春天特有的气息。垂柳泛出若有似无的青色，柳丝软了，在东南风的吹拂中轻悠悠地摆动，再不象冬天那样僵硬，西北风一刮，便发出金属线般尖利的嘶叫。

姚书记走几步还常常停下来，看看呼隆隆行驶的车辆和急匆匆赶路的行人。男女老少，五行八作，不管以什么形式

奔向什么目标，他们都由无数条想象中的线跟市委大院联系着。而市委大院的无数个线头又都集中于姚达一身。他是城市的总设计师、总控制师、总工程师、总导演、总司令。每当这时，他心里总涌起一种庄严的自豪感、责任感、使命感、时代感和权威感。

来到市委大院的大门口，他又略微停了一下。他对市委大院的大门很满意。大门很宽敞，至少可以容许三台小轿车同时进出。他更欣赏的是大门的两个巨大的门柱。据设计人员说，它是仿照某军区司令部的大门设计的，只比军区司令部的门柱略小一点。门柱的外形看上去有点象南京长江大桥的桥头堡，很是威武壮观。去年修建时曾有人建议用白色大理石贴面，有人主张用汉白玉镶面，但都被姚达否决了：“一个大门嘛，太奢华了，影响不好。”于是改用白色水刷石。白色水刷石的墙面视觉效果也不错。朴素无华的乳白色不但看着舒服，还有点象征意义：党的机关的清廉和纯净。高高挂起的市委的牌子是用了雕刀的，字色正红，不但跟门柱的色彩谐调，同时也有象征意义：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道路和对党的事业的赤诚。门是钢管焊的，但没有沉重、森严之感。它是折叠式的：大门打开之后，每一扇可以折成三折，放进门柱里。这样不仅开启灵活，车辆进出方便，同时也给人一个“党的机关永远向人民敞开大门，没有任何阻碍”的感觉。

姚达欣赏的眼光突然变得认真起来。他把头侧到右面看了看，又侧到左面瞧了瞧，又后退几步打量一下，禁不住皱起眉头：怎么搞的？左边的门柱好象有点倾斜？不是“好象”，而是确实倾斜了。

门卫老齐正在门口站着。姚达招招手，把老齐叫过来，让老齐验证一下。

“是有点歪，姚书记。我前两天就看出来了。”老齐说。

“看出来了，为什么不早说？”姚达问，“邵秘书长知道不？”

“我没跟秘书长讲。我想问题不大。”

“哼，”姚达冷笑一下，“不知怎么搞的，人心都长到肋巴上去了——国家的事，集体的事，再大也是小事！”

姚达回到办公室，马上找来市委秘书长邵含章。邵含章是位老同志，论资历并不比姚达浅，还是市委常委。姚达不便批评指责，只问邵秘书长知不知道门柱倾斜的事。邵秘书长说他没大留心，这一阵子忙得他晕头胀脑。

“你是不是去看一下，看看能采取什么措施。其他工作暂放一放。”姚达说，“万一倒了，砸了人，就麻烦了。”

邵秘书长对姚达是充分尊重的。他马上找来办公室主任詹天时。詹天时对建筑一窍不通，便叫来总务处长王同顺。这事本来跟秘书处无关。但是秘书处的女处长王芷对书记交办的事向来热心，便也跟来了。

在邵秘书长的率领下，一行人来到大门柱前，近瞧瞧，远看看，一致断定：大门柱的确莫名其妙地倾斜了。不必用什么精密的测量仪器，肉眼一看，就看出是歪了。总务处长王同顺凭经验估计，起码倾斜了两拳头，20厘米。可是，倾斜这么严重，在姚书记注意之前大家竟没有发现，实在有点不好意思。

认定程序结束了，下一步便是研究解决办法。邵秘书长又把这些人拉回秘书长办公室。

总务处长王同顺认为，门柱歪是歪了，但是倒塌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只是有碍观瞻。

办公室主任詹天时同意王同顺的意见。这个门柱是去年入冬前修建的，才几个月，拆了实在可惜。重修一个门柱，材料人工加在一起，至少要三四千元。办公室没有这笔开支。再说，过几天还有日本一个友好城市的代表团要来。门柱一施工，弄得乱糟糟的，反倒不好。外国人反正坐在汽车里，一出一进，也不会注意门柱是不是倾斜。结论是“过一些时候再说”。

邵秘书长觉得王同顺和詹天时说得有些道理，倾向于暂不处理。

秘书处王芷提请大家认真对待姚书记的意见：“门柱倒掉的可能性不大，但不是没有。既然已经倾斜了20厘米，就难保证不继续到30厘米、40厘米。再说大门口经常有大小汽车经过，汽车的震动很可能加速门柱的倒塌过程，说不定会正好倒在汽车上，那就可能出大漏子。因为一般干部是不坐汽车的。”

这一番话把大家说得面面相觑，半晌无言。王芷的话意味着：不出事便罢，出了事，特别是市委领导出了事，就吃罪不起。明知会出事，你不采取措施，情同谋杀！

“外国人来时肯定有一些记者。就算外国的官员不大注意，那些象耗子一样到处乱窜的记者会注意的。”王芷继续说，“一旦他们注意到门柱歪了，说不定就会牵强附会，做一番文章，说我们市委要‘倒牌子了’，象征着‘上梁不正下梁歪’了，什么话都可能说得出来。这事张扬出去，就不是一个门柱的问题，而是一个市的形象问题，甚至是改革之中的中国的形象

问题。”

不管市委书记姚达如何关心，也不管王芷把问题提高到多么吓人的程度，在市委的工作日程上，一个门柱的倾斜毕竟是件小事。邵秘书长，甚至办公室主任詹天时都有权拍板拆或不拆。可是，事情又不这么简单。这里偏偏杀出一个秘书处王芷来。

论官，王芷是个处长。主任、秘书长都管着她。可谁都知道王芷跟市委书记姚达有一层特殊关系。连姚达本人也承认王芷对他有“恩德”。在姚达住“牛棚”的时候，作为普通“革命群众”，王芷曾悄悄地给他买过胃药，买过一条“大生产”，给他通风报信，还给他写过一条纸条：“千万不要有不好的想法。”那时，姚达是市委统战部的副部长，王芷是部里的干事。二十年来人们都私下议论：王芷跟姚达书记的关系还不止于此。不管什么关系，反正王芷一说话，人们就不能不考虑姚达会是什么态度。

思之再三，邵秘书长说待他请示姚书记之后再定。

礼多人不怪，请示多有好处。邵秘书长还真请示对了。姚书记的意见很明确：王芷同志很敏感。我觉得她的想法是对的。同时还要查一下：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质量问题？

邵秘书长把姚书记的意见迅速传达给办公室主任詹天时，请詹主任抓紧办理。詹天时又把任务交给总务处长王同顺。

王同顺向来看惯王芷的依官仗势、飞扬跋扈、鼓唇摇舌、咋咋唬唬的德行。

“挺好一个门柱，歪一点有啥关系？市委的形象好坏也

不在一个门柱上。要是门柱正了，市委的形象就好了，那咱们去把贝聿铭请来，造一个最现代化、最端正的门柱！”王同顺跟詹天时发牢骚，“市里的危险房那么多，老百姓在砖头、水泥板下过日子，说不定哪一天哗啦一下，都变成肉馅，没见谁象对门柱这么急！”

詹天时批评了王同顺：“你也是老同志了，不能象小青年那样拿起话来就说，要注意影响。意见归意见，工作归工作，还是赶快安排一下。”

王同顺还是个听劝的人。不听劝也没办法，共产党员嘛，正在端正党风，反对自由主义，组织纪律观念还得有，那就着手办吧。

第一，要找施工队。这个门柱是一个区的工程队给建的，结果出了这样的麻烦；这次不用这群王八蛋了，另找技术力量强的，负责任的，找市二建。

第二，新门柱在原基础上建显然不行，难免再出毛病，须把原来的基础挖掉。这样一来，市委的大门口就不能走汽车了。市委大院不通汽车，无异于人血脉不通，神经阻隔。这还了得？须得另开一个临时门。门只有开在市委领导家属院跟市委大院之间的隔墙上。

原先隔墙上曾经有过一个便门，后来堵死了。堵死这个便门的原因有好几条：一是家属院的孩子们经常从便门渗透到市委大院来玩战斗，到自行车棚上练飞檐走壁，在花圃里比赛八卦掌，醉棍竟扫到市委书记办公的走廊里。这里就有姚达书记的孙子。姚书记看着自己孙子的表演很有趣，但对其他孩子的胡闹又很反感。门卫总不能只为姚书记的孙子开绿灯，而把其他孩子拒之门外，索性把门堵上就是了。二是

家属院里常有一对对青年男女到大院来。特别是黄昏后，夜幕下，大院里有花有草有石有树的地方，总有一对对情人在联络感情。这种情形如发生在公园里，小河边，也属正常。但出现在堂堂的市委大院，上百万人口的领导中枢，就有失严肃和庄重。三是给上访告状的人开了方便之门。某些指名道姓要找某书记、某常委的上访者，某些集团性上访者，某些有名的上访专家，大门的门卫不让他们进院。几经查访，他们就找到了这个方便之门。此一举对市委领导的干扰要比八卦掌和醉棍厉害得多。还有一个原因，是不便说的：市委领导的安全问题，机关的安全问题。当然，从市委大院建成以来，这里尚未曾发生过针对市委机关或市委领导的暴力事件。恐怖主义活动震撼着西方世界，别的东西能传播进来，对恐怖活动也不能不加防范。中国公民没有私人汽车和枪支、弹药，但是当年兴修水利大会战却训练了一些硝酸炸药爆破手。万一轰然一响，人、财、物损失大小不说，“市委挨炸！”这政治上的恶劣影响就难以弥补。其他原因还有，但择其要者是这么几条。

现在要重新打开这个方便之门，而且还要进出汽车，为了不致出现过去的情况，就必须在便门上设门卫。门卫至少要有三个人。门卫又不能二十四小时象棍子似地立在那里，还得建一个临时门卫室。

第三，要有经费。建个门柱事情不大，花费也不多，但属于基建，必须请拨专项经费。不过，市委兜里没钱，要花钱必须找市政府。在市里，市委有不容争议的决策领导权，但是行政大权，特别是经济大权又掌握在市政府。任何宏观决策都会给执行者留下体现自己个性的余地。市长是市委副

书记，但他决不肯把市政府变成市委的副手。因此，在书记和市长之间总有一种微妙的、人人嘴上都不说但人人都可感觉到的不协调。王同顺必须以办公室的名义先给市委写份申请基建经费的报告，同时抄报市政府、市计委、市建委、市财政局。待市委书记或主管书记批准后，再持书记的批件去找市长或副市长，经过几道关卡，最后才由财政局审核，决定给不给钱，给多少。

总务处长王同顺马不停蹄，足足跑了十四天，经费、便门、施工队诸项才有了眉目。这期间，姚书记亲自过问了三次，秘书长过问了六次，办公室主任詹天时无时不在过问。准确点说，事情是詹天时和王同顺一起干的。

诸事齐备，正待开工，姚达书记又把邵秘书长和詹主任找了去。

“你们考虑过没有——”姚书记问，“大门的两个门柱是同一个施工单位、按同一个图纸、用同一种材料、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修建的。既然左边这个门柱会倾斜，那右边那个门柱会不会倾斜？”

这个问题把秘书长和办公室主任都问傻了。迄今为止，除了花钱重建门柱，他们谁都没有去研究左边这个门柱为什么会倾斜，右边那个门柱会不会也要倾斜。既然姚书记一连讲了五个“同一”，那就可能会引出第六个“同一”：同一个命运。前五个“同一”是已知的，没有争议的。第六个“同一”是未知的，只是一种“可能”。但他们不是建门柱的专家，也不是算命先生，谁又知道这个可能性大小？

“做工作、办事情总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要有点预见性，有个全局观念，整体观念，有个宏观把握。”姚书记

说，“不然，费了好大力气，刚把这个倾斜的修好，那个又歪了。市委机关一年四季都在那儿修大门，这不是开玩笑么？你们是不是再研究一下？”

邵秘书长和詹主任从姚书记那里出来，马上找来王同顺，传达姚达的意见。话还没说完，王同顺又发起牢骚：“市委领导早干啥来？要是早说两个门柱一起拆，一起建，我打一个请示经费的报告也就行了。求爷爷，告奶奶，刚刚把经费弄到手，现在又决定两个一起拆建。我还得重新请示一遍。脱了裤子放屁，这不是折腾人么？”

詹天时想出一个办法：“我看不必重新写报告也行。跟各有关部门说一下，把申请经费的数字改一下就行了。”

邵秘书长说：“不然先动工修，最后结帐时看缺多少，再跟政府那边交涉。我想问题也不大。”

“不行，不行。”王同顺说，“你们不办具体事，也就不知道跟政府那边的人打交道该有多难。修一个人家还不愿给钱，说市委这面的人专好整门面，摆阔气。同时修两个，再先斩后奏，政府那面就更不痛快了。‘你市委办公室多个啥？以势压人吗？不怕！按规定办事！’不但不给你报帐，还可能发你的通报。”

“不至于吧？”邵秘书长说。

“当然，他们胆子再大也不会批评市委，而是批评我王同顺。到那时候，市委和市政府的领导为了表示彼此之间的和谐和团结，都会把责任推给各自的工作人员。这么一来，吃亏的还是我。我的脑瓜皮比鸡蛋皮都薄，这种事我不干。”王同顺说。

当此之时，如果邵秘书长和詹主任拍拍胸脯，说两句承

担责任的话，王同顺也许会改变态度。可惜秘书长和办公室主任都不想说这样的话。

总务处长王同顺又开始了新一轮请示。这一轮花费的时间不比第一轮少，因为增加费用的理论基础是“可能”。让人们相信“可能”要比相信事实困难得多。

时间又过去了半个月。市委大院前的垂柳长出蝇翅似的小绿叶，结出了鹅黄色的毛毛狗儿。柳树间的碧桃长出了骨朵，又开过花，花又谢了。一簇簇的嫩叶又冒出来。

日本友好城市的代表团来过了。也的确有一群挎照相机、扛摄像机的记者，但倾斜的门柱却没有引起国际上的强烈反响，国内似乎也没人议论，至少到目前还没听到。这使姚达感到宽慰，感到庆幸，但同时又对市委机关办事效率之低感到恼火。见事迟固然危险，但行动慢，拖拖拉拉，松松垮垮，也同样危险。它不仅是腐朽的征兆，而且是灾难的前奏。说不定哪一天这该死的门柱倒下来，把哪一台倒霉的汽车砸个稀烂。他再三叮嘱司机，汽车过大门的时候，没特殊情况不准减速，要象冲破封锁线、躲开炮弹那样迅速开过去。每次从大门口冲过去，他都有一种飞机的轱辘终于接触了跑道或从“惊心石”下走过来的轻松感。自从开了便门（这是为门柱工程开工做的准备工作的一部分），姚达索性就不再走大门了。

开工准备终于就绪。王同顺带着施工队长来到门柱前。安排施工细节。这时，就在这时，奇迹发生了。

“我说王处长！”施工队长指着门柱，“你是不是搞错了？”

“怎么了？”